

# 试论孙中山晚年的“大亚洲主义”

屈建军

(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 陕西西安 710077)

**摘要:**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意在建立东方反帝反殖民的统一战线,争取亚洲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此,孙中山论证了亚洲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正当性,强调亚洲人民团结联合的重要性,突出“诉诸武力”收回亚洲所失权利的必要性。但孙中山未能汲取抵制殖民主义侵略的科学理论,亦未彻底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这些缺陷制约了“大亚洲主义”战略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中国;日本

**中图分类号:**TP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10)03-0042-04

## 一、“大亚洲主义”的基本内容

“大亚洲主义”一词最初见于1923年孙中山先生致日本犬养毅的书信。嗣后,他在1924年有关民族主义演讲及赴京途经日本时的演讲中又作了系统阐述。“大亚洲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晚年国际战略的重大变化。

“大亚洲主义”的立论依据,在于欧洲对亚洲的侵略。19世纪中叶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东侵,亚洲许多国家逐渐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孙中山长期奔波于海外,对欧洲殖民者压迫、奴役和歧视亚洲人的状况有深切的感受,这是他提出“大亚洲主义”以抗拒欧洲侵略,捍卫亚洲独立的立论基础。孙中山指出:几千年以前,我们亚洲人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文化,但近代欧洲各国强盛起来后,“他们的势力更渐渐侵入东洋,把我们亚洲的各民族和各国家,不是一个一个的消灭,便是一个一个的压制起来。一直到三十年以前,我们亚洲全部,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sup>[1]401</sup>可见,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正是基于近代以来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亚洲的侵略,亚洲各国普遍沦为欧洲强国的殖民地这一严峻的现实。在他看来,既然亚洲各国有着大体相似的不幸遭遇,那么,摆脱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理应成为亚洲各国人民面临的共同任务。所以孙中山提倡“亚洲是一家”,呼

吁亚洲各被压迫民族团结联合起来,发起“亚洲大同盟”,以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大亚洲主义”的宗旨在于团结亚洲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孙中山强调,“大亚洲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的问题。”<sup>[1]409</sup>很显然,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其目的在于反对“压迫民族”,斗争的矛头直指西方殖民主义,反映了亚洲被压迫人民要求挣脱殖民枷锁的愿望。鉴于亚洲事实上远远落后于欧洲,所以孙中山指出,亚洲人民要求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就必须加强团结和联合,这样才能增强实力,共同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说: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向来都不是统一的。此刻要亚洲富强,要联成一个大邦,那才可以说得通。1924年6月23日,孙中山在与菲律宾劳动界代表的谈话中,就菲律宾代表提出的美国对菲律宾的管制权问题亦指出:“时势至此,东方各民族非结一坚固同盟不可。”<sup>[2]324</sup>在孙中山看来,亚洲各国人民只有联合起来,才能避免因力量弱小被各个击破,才能真正壮大自己的实力。相反,如果自顾家门,各自为战,显然不利于亚洲人民。不难看出,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就是要在亚

收稿日期:2010-03-15

作者简介:屈建军(1958-),男,陕西户县人,硕士,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教授

洲建立起反帝反殖的东方统一战线,以抵制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亚洲的侵略和奴役。

“大亚洲主义”的文化基础是所谓的“王道”,亦即“我国固有的文化”和“仁义道德”,其实质是以东方的“王道”反对西方的“霸道”。孙中山指出:“大亚洲主义”研究的重要问题,“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sup>[1]407</sup>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得失,孙中山进而指出:“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sup>[1]407</sup>透过这些传统观念,孙中山实际上倡导的是“求一切民族和平、平等、解放的文化”,并希望以此作为各国人民——首先是亚洲人民团结联合、和平共处的行为规范。不过,孙中山也非常清楚,仁义道德只能作为维系亚洲人民团结的精神纽带,却不是对付欧洲强权的灵丹妙药。他同时强调:“对于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孙中山坚信:“如果亚洲民族全联合起来,用这样固有的武力去和欧洲人讲武——一定是有胜无败的。”<sup>[1]407</sup>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面前,亚洲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各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协调甚至矛盾。怎样使亚洲各国人民消除隔阂,精诚团结,一致对付西方殖民主义者,就需要有一种大家都能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基础。在孙中山看来,这只能是东方固有的文化——仁义道德。应当承认,孙中山以“仁义道德”作为“大亚洲主义”的文化基础,以“王道”作为维系亚洲各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并藉以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霸道文化”,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仁义道德是东方世界几千年留传下来的传统美德,符合东方人民的道德心理和价值追求,至少在东方仍相对封闭的20世纪初,它容易为亚洲各国各民族所理解和接受。而且,东方的“王道”和西方的“霸道”势如水火,也能使普通民众直观地认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本质,激发其反帝

反殖的斗争勇气。更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认识到仁义道德只能实施于被压迫者,却不能施行于压迫者。对于推行“霸道”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只能坚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取“诉诸武力”的策略。但同时也要看到,尽管孙中山已经赋予了“王道”和“仁义道德”以新的内涵,但这种抽象的道德观念仍然难以确切地反映和满足亚洲被压迫民族在20世纪初反帝反殖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情况下。当然,对于这种局限性,我们应该历史的看待,而不应该苛责于孙中山。

振兴亚洲,摆脱列强奴役,主要靠发挥中国和日本的领导作用。孙中山认为,要最终振兴亚洲,首先要解决“振兴中华”的问题。因为“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又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明。何况中国乃“受屈者之中坚”,一旦振兴,就可望对亚洲解放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为“支那之革命,为欧洲列强所最忌者。盖支那革命一旦成功,则安南、缅甸、尼泊尔、不丹等国,必仍愿归附,为中国屏藩,而印度、阿富汗、亚刺伯、马来亚等民族,必步支那之后尘离欧而独立。如此,则欧洲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必至失败。是故支那之革命,实为欧洲帝国主义宣布死刑之先声也。”<sup>[3]404</sup>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暂不具备充当世界潮流领导者的国力,他的政治理想虽然高远但却缺乏实际推行的措置和依托。而与中国“同文同种”的左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独立而强势的国家,所以孙中山希望日本能作东方王道之干城,领导亚洲各国以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问题在于,他所希望的日本王道并未出现,而日本政府却将霸道引入国策,在崛起过程中重复了西方殖民主义的行径,并将侵略的矛头对准中国,这是孙中山先生生前所没有预见的。

## 二、“大亚洲主义”的总体评价

评价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有两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一是“大亚洲主义”有无狭隘的地域性和种族性的问题;二是“大亚洲主义”对日本政府有无幻想和依赖的问题。

关于“大亚洲主义”是否具有狭隘的地域性和种族性特征,如果仅从字面上看,“大亚洲主义”是排拒欧洲的,似乎带有狭隘性的纰漏。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大亚洲主义”冲着西方殖民主义而来,不是针对西方文明世界而言。孙中山所

倡导的“大亚洲主义”,虽然以亚洲为范围,但出发点则是亚洲人民大抵为“受屈部份之人类”,并且考虑了他们正在共同奋起“抵抗欧洲强权”的事实。在孙中山看来,欧洲的白人并不是大亚洲主义简单反对的对象,起码俄国就不是反对的对象。“俄国现在要和欧洲的白人分家。……因为他主张王道,不主张霸道,他要讲仁义道德,不愿讲功利强权,他极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sup>[1][409]</sup>进一步说,即使同为欧洲白人,也有压迫民族和受压迫民族之分,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别。“受压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亚洲专有的,就是在欧洲境内,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sup>[3][403]</sup>孙中山指出,殖民主义者只是极少数人,而受压迫、受奴役的人则是绝大多数,应该把广大“受屈者”联合起来以对抗“横暴者”的欺凌,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为了扩大反帝反殖的统一战线,亚洲被压迫人民应该联合欧洲受压迫的人民,“排强权者固以亚洲受屈之人民为多,但欧洲受屈人民亦复不少,是故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者。”<sup>[3][403]</sup>由此看见,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基本上仍属于政治性概念,而非种族性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的反对西方,只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不是简单地排拒欧洲敌视白人,相反还把欧洲“主张公理”的白人引为朋友,对于“极力主持公道”的苏维埃国家更视为同志。所以,“大亚洲主义”不存在狭隘的地域性和种族性的问题。

关于“大亚洲主义”对于日本政府有无幻想和依赖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一定幻想,也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未能充分认识它同亚洲被压迫民族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但实际上,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从依靠日本支持到抨击日本军阀政策,再到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递进演变的过程,前期和后期并不完全相同。在孙中山革命的前中期,孙中山确曾希望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他多次造访日本政要并长期居留日本即其例证。1914年日本强占胶州湾和青岛,并将当年侵略朝鲜之手段施行于中国,孙中山遂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从“步武泰西”逐步转向“以俄为师”,开始放弃对日本政府的依赖,并抨击日本军阀的侵略政策。如1923

年11月16日,孙中山在《致犬养毅书》中,虽然表达了希望中日联手实施他的“大亚洲主义”的愿望,但同时亦表示了对日本政府的失望和不满。他指斥日本政府“向以列强之马首是瞻”,“只知步武欧洲之侵略手段。”<sup>[3][402]</sup>由于“日本对于支那之革命,十二年以来,皆出反对行动;反对失败,则假守中立以自文。……致支那志士之痛恨于日本,较列强尤甚者也。”<sup>[3][404]</sup>如此等等,皆见其希望之殷,不若痛诉之切。在书信的末尾,孙中山还警告犬养毅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须知欧战后,不独世界大势一变,而人心思想亦为之一变,日本外交方针必当随而改变,乃能保存其地位于世界也,否则必蹈德国之覆辙无疑也。”<sup>[3][406]</sup>应该肯定的是,孙中山当时已经窥见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亚洲的狼子野心,尽管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本政府的幻想,但更多的则是寄希望于日本国民的觉醒,希望日本民族“做东方王道的干城”,中日“两国国民应该要携手”。这些事实说明,孙中山晚年的对日态度已在悄然地发生了某些变化。

总之,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致力于改变亚洲20世纪初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呼吁以中日合作为基础,联合亚洲其他民族,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争取亚洲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反映了亚洲被压迫人民要求挣脱殖民枷锁的愿望,具有历史进步性。孙中山论证了亚洲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正当性,强调亚洲人民团结联合的重要性,突出“诉诸武力”收回亚洲所失权利的必要性,阐明实施“大亚洲主义”时应该抛弃狭隘的种族性,以及在实际斗争中给予亚洲人民以力所能及的援助,彰显了作为世界级伟人的孙中山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和天下为公的广阔胸怀。但由于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还不能有效地把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理论引入他的“大亚洲主义”,而只是把抽象的并且已经过时的“王道”和“仁义道德”作为反抗殖民主义侵略和奴役的理论武器;也没有完全放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总是一相情愿地期望日本政府在亚洲复兴方面有做作为,正是这些缺陷制约了“大亚洲主义”战略的顺利实施。我们固然不应据此苛责孙中山,但还是应该指出其“大亚洲主义”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 [1]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张国春)

# An Analysis of Sun Yet-sen's "Great Asian Doctrine" in His Late Years

QU Jian-jun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vision of Xi'an Aerotechnical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77)

**Abstract:** "Great Asian Doctrine" proposed by Sun Yet-sen was intended to set up a unified front to fight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the East, with an attempt to gain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Therefore Sun Yet-sen verified the justice of the Asian people fighting against the aggression of the great powers,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unification and coalition of the Asian people, highlighting the necessity of regaining the lost right by force. However, he could not apply 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fighting against colonial aggression, and he had seen through the nature of the Japanese militarist aggression. All these faults prevented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his strategy of "Great Asian Doctrine".

**Key words:** Sun Yet-sen; "Great Asian Doctrine"; China; Japan